

孟世凯◎主编

赵光贤先生 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孟世凯◎主编

赵光贤先生 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赵光贤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孟世凯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3

ISBN 978-7-5004-9657-1

I. ①赵… II. ①孟… III. ①赵光贤 (1910 ~ 2003) —纪念文集 IV. ①K825.8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50467 号

责任编辑 储诚喜
责任校对 王有学
封面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技术编辑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盛天行健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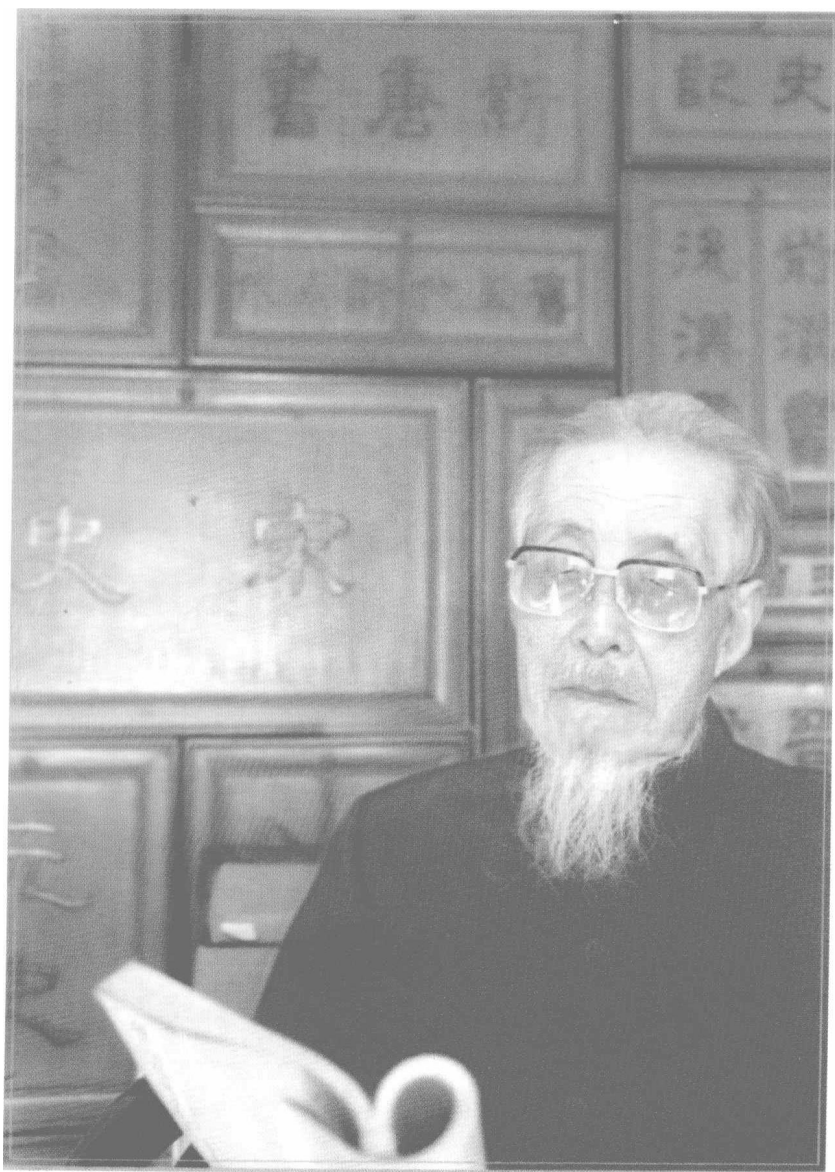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35.25 插 页 6

字 数 580 千字

定 价 9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赵光贤先生像



赵光贤先生为邯郸市博物馆开馆仪式题词（1987年）



赵光贤先生在第一届全国赵文化学术研讨会上（1987年）



赵光贤先生（中）与弟子晁福林（左）、沈长云（右）在一起（1987年）

赵光贤先生诞生百年纪念

考史功深堪称巨擘

育才绩茂不愧名师

刘家和教授

刘家和教授为赵光贤先生百年诞辰题词

赵光贤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编委会

主 任：孟世凯

副主任：晁福林 沈长云 杜 勇 官长为

委 员：王 和 王冠英 白国红 杜 勇

孟世凯 官长为 段志红 彭 林

主 编：孟世凯

副主编：沈长云 杜 勇 白国红

序 言

今年是赵光贤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由他的诸门生发起，中国先秦史学会参与共同运作，出版《赵光贤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下简称《纪念文集》）。编委会要我写序言，本不敢当，但在赵老的私淑弟子中我是年逾古稀之一，只好勉为其难。《纪念文集》征稿信息发出后，赵老的门生和私淑弟子纷纷响应，因集稿只有半年时间，虽然有的因事未按时交稿，但是并不影响出版。在这本《纪念文集》中大家充满了对这位品学兼优、德高望重老人之深情怀念。在此，我代表《纪念文集》编委会向提供大作的各位女士、先生表示衷心感谢！

赵光贤先生虽然离开我们已经七年，但是这位著名的古史学家、先秦史专家的音容笑貌时常在我们思念中显现，每当我和他的门生或先秦史学界的朋友们相聚时，都情不自禁要回忆起与这位学问精湛、为人正直、德高望重之老先生相处的岁月。赵老在清华大学就读时学过西洋政治史和西洋近代史，又师从陈垣先生学习历史研究法，学会对史料的搜集、甄别、分类、考证、分析研究等等，练就研究历史的一身硬功夫。民国二十九年（1940），从辅仁大学史学研究所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在历史系教西洋上古史和外语系的世界史，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又改教先秦史。先生不仅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史学大家，也是保持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严肃的中国史学专家。我们与之接触时他喜谈学问，语速较慢而出口成章，但又非那种天南海北炫耀自己，或故作深奥卖弄学问之人。谈学术时常于引经据典之中不时有几句风趣之词，使听者在轻松气氛中有深刻体

会。先生治学从来一丝不苟、一贯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他的硕士、博士和聆听过他讲学的人都深有体会。

在学术研究上赵老有自己的道德立场，无论处于何种政治气氛中从不当风派学者。对于古史分期问题始终不渝持西周封建论，他的名著《周代社会辨析》，即是有史有论自成体系之典型，所以在学界有很大影响。1982年5月，中国先秦史学会成立，赵老当选为副理事长（又称副会长）。11月中旬我去向他汇报学会工作，拟在次年召开西周史学术讨论会，他说自己早就在研究武王伐纣和西周诸王年代，如果说武王伐纣年代有个基本解决，则西周诸王年代也就有了说法，要我以后开会时将这个内容安排进去。从1983年首届西周史会之后多数学术会都安排有武王伐纣年代议题，1992年在西安开第二届西周史会，特邀十位对此有研究的中外学者参加，赵老亲自主持座谈会，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先秦史学会的学术会议。他发表有关武王伐纣年代的文章，是以文献、古文字（甲骨文、金文）、天文学和考古遗存资料等进行综合研究。“夏商周断代工程”筹备时征求赵老的意见，他也建议以上述学科开展综合研究，“断代工程”基本上采纳他的建议按专题设置课题研究。

赵光贤先生是先秦史学界的前辈，学问、人品皆为大家所称颂。抗战时日寇侵占北平，民国二十三年（1944）3月，日寇宪兵大肆逮捕辅仁 and 燕京两校教师，赵老亦被关入狱中，他以大无畏的坚毅民族精神对付日寇摧残，日寇投降以后才出狱。20世纪50年代后期风云突变，刮起一阵邪风，不少知识分子被这股邪风击中，赵老在养病中写一封教改的建议信，按组织原则上交，次年也被凑数邪风所击中。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他和大家一样欢庆新时代的到来，恢复教学后虽已年逾古稀，但首先想到将自己的学问传承于后学，招收研究生制度恢复后就开始招生。他重质量而非数量，因此培养的研究生毕业后在各自岗位上都成为骨干或担任各种领导，有的还担任过较高学术职务或参加大型研究项目。赵老还有大量的私淑弟子，仅中国先秦史学会会员、理事中就有几十人，加上国内慕名投入门下者已逾百人。之所以如此，除仰慕赵老的精深学问外，他平易近人、开朗谦逊、喜谈学问、为人正直也是为大家所敬仰的原因。赵老从来不轻易诉说自己之经历，即使有问及者，也未见他夸耀或撒过怨气，总是笑笑说：“是有那些事，都是过去的了。”

赵光贤先生在先秦史学会中担任了前三届理事会的副会长，当年未设

有常务副会长，赵老实际上是起了常务副会长的作用。学会是挂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北京的副会长中，李学勤先生担任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工作较忙，胡厚宣先生则忙于筹建甲骨学会（后改为殷商文化学会，于1987年9月成立），也难以分身。因此，学会的很多事都是由赵老关心、过问的。自1982年至1992年，学会召开的十次学术会议他参加了七次，我这个秘书长也常去向他汇报工作，商议学会的建设和学术活动开展事宜。尤其令人难忘的是，先秦史学会在发展中出现一次危机、一次困难，即1989年11月，在河南召开的第四届年会中，赵老仗义执言制止了企图分裂学会的行为。1991年11月，学会在上海召开第五届年会前，赵老带头动员老副会长退居二线当顾问，使这届年会顺利地实现转型（参见本文集我写的回忆文章）。今天先秦史学会的学术活动基本上还在依照赵老的思路实行。总之，赵老在古史研究、培养新一代先秦史研究生和进修生，特别是在先秦史学会的成立和发展中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将彪炳千古！

孟世凯

2010年9月2日

目 录

序言	孟世凯 (1)	
不会忘却的纪念		
——写在赵光贤先生百年诞辰之际	瞿林东 (1)	
启迪后学的至理诤言		
——读赵光贤教授《我的自述》有感	詹子庆 (7)	
回忆赵老与中国先秦史学会	孟世凯 (10)	
赵老对史学理论建设的关注和对“奴隶社会并非人类历史 发展必经阶段说”的鼓励、支持		张广志 (19)
赵先生对历史年代学研究		
——西周年代与《竹书纪年》	张培瑜 (23)	
发扬治史的求实精神		
——缅怀著名史学家赵光贤教授	李仲立 (33)	
难忘邯郸	孙敬明 (37)	
赵老在我心中	张闻玉 (39)	
求真与创新:先秦历史与先秦社会的深入研究		
——纪念赵光贤先生百岁诞辰	晁福林 (41)	
赵先生的西周金文暨西周年代学研究	沈长云 (47)	
慎终追远,厚德载物		
——追念赵光贤恩师	王 和 (54)	
奉生恩师教我治学	彭 林 (65)	
忆两次回校之事	段志洪 (76)	
师门杂忆	晁福林 (80)	

怀念赵师光贤	沈长云 (82)
悼念吾师赵光贤先生	杜 勇 (87)
回忆赵光贤先生	吴高歌 (90)
师者已去,世范长存	
——忆赵光贤先生	刘 伟 (94)
尧文化的内涵和传播	詹子庆 (98)
黄帝与黄帝文化的南迁	赵世超 (102)
古史传说中的“虚”与“实”	王震中 (114)
新视野下的中国铜石并用时代	裘士京 郝梅梅 (129)
古姓起源与炎黄历史文化研究	魏建震 (135)
部族时代:良渚文化与古史体系之建构	
——纪念赵光贤先生百年诞辰	李学功 (145)
由一个假设所引发的争议	
——读《顾颉刚年谱》札记之一	宫长为 (157)
从夏商周王朝的建立看中国古代原生国家的形成	
途径及其特征	叶文宪 (168)
古蜀文明的地理环境与文化生态	段 渝 (224)
先秦江苏地区古文化在文明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王 健 (232)
契斋藏甲与北大所藏同文骨片真伪风波补议	曹定云 (249)
瑶台与上古时期风俗	罗新慧 (260)
试论商族早期军事力量的发展	朱彦氏 (268)
殷墟甲骨文中的“妇”	赵 鹏 (293)
先秦文献征引《汤誓》考	刘义峰 (300)
论宋代著录的周公方鼎	李学勤 (307)
周代交聘管理机构与官员	黎 虎 (311)
西周王畿问题辨析	赵伯雄 (334)
西周灭亡原因新释	李秀亮 (342)
说“事”	
——商周时期指定服役的表现形式	卢中阳 (351)

论《易传》对《周易》神学卜筮体系的改造	陈恩林 (360)
中国古代的消息卦和卦爻	郑慧生 (372)
太极、大恒考辨	蔡运章 (375)
先秦的记事史官与史籍	葛志毅 (386)
中国传统整体价值观基本取向的现代价值	李瑞兰 (406)
简帛金文所见楚郢都探研	罗运环 (420)
从《孟子》“晋曰《乘》”为“年”之讹说到先秦	
东西方国家编年体史书的区别	王 晖 (427)
论《春秋事语》与《左传》的关系	杜 勇 (440)
《左传》古地三题	陈立柱 (452)
春秋霸主政治的几个问题	邵 蓓 (465)
山左金石学与钱币学史	孙敬明 (474)
先秦赵世系中赵夙与赵衰辈分新证	白国红 (488)
从司马谈与冯遂的关系推《史记》中《冯唐列传》和	
《赵世家》作者	侯廷生 (495)
中山国墓葬习俗探研	何艳杰 (504)
试论战国时期代地地理及相关问题	雷鹤宇 (520)
附录:我的自述	
——学史贵有心得	赵光贤 (527)

不会忘却的纪念

——写在赵光贤先生百年诞辰之际

瞿林东

—

1962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读本科三年级时，赵光贤先生为我们开设了选修课“先秦史”。我是1959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正赶上学制改革，由四年制改为五年制。系主任白寿彝先生、副主任何兹全先生，动员全系有资历的教师为我们年级开设选修课。当选修课程目录公布后，同学们根据自己的兴趣，纷纷选择有关课程（记得只要有五个以上的同学选修，就可以开课）。我对中国古代史有兴趣，就选择了赵先生的“先秦史”。这也是我认识赵先生的开始。

记得赵先生讲了十个左右的专题，其中有些内容就是他在“文革”后出版的《周代社会辨析》（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一书中所讲到的。“文革”中没有失去书稿，真是先生的幸运。

赵先生讲课，时时要涉及考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考证是不受重视的。也可能是同学们不习惯于老师在课堂上讲考证的意见传到赵先生那里，所以有一次赵先生在课堂作解释，说过去有人为了说明“春王正月”四个字，就讲了上万言，我讲了一点点考证，不足为怪，希望同学们能够了解这些情况。听了赵先生的这番话，多数同学也就不再有这方面的议论了。

赵先生在学术观点上，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反映出一种执著的精神。他在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上，不赞成郭沫若先生的观点，讲课中时时提出与郭说不同的说法。这给同学们留下很深的印象。

二

1963年，我们到了四年级了，系里要求每个同学都要撰写学年论文，一年时间，在不停课的情况下逐步写成。同选修课一样，担任学年论文指导的老师们公布了一批选题，由同学们自由选择。我考虑再三，选了“春秋时期各族关系”这个题目。这个题目也是由赵光贤先生命题并由他作指导的。记得开始有好几位同学选了这个题目，但后来大多又重选了其他题目。我因对这个题目有兴趣，也就坚持了下来。

春秋时期各族关系很复杂，当时又没有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可供参考。蒙文通先生的《周秦少数民族研究》和马长寿先生的《北狄与匈奴》等书，就成了主要参考书。在赵先生指导下，我从图书馆借阅了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主要研读了其中的《四裔表》，逐步清理出一点头绪。在征得赵先生同意后，我计划按照中原诸华、诸夏分别与北方狄族的关系，与东方夷族的关系，与南方蛮族的关系，与西方戎族的关系，逐步展开撰写。经过一年的努力，我只写出了诸华、诸夏与北狄的关系，并以此作为四年级的学年论文，交了卷。赵先生建议我在五年级写毕业论文时，把其余几个部分也写出来。当时，我自己也有这个想法。就这样，我在赵先生指导下，写出了一篇3万字的大学毕业论文《论春秋时期各族的融合》。

在撰写这篇论文的过程中，接触到许多材料，其中关于民族间的冲突、战争、会盟、通婚等等。为什么我把论文的重点放在“融合”上面呢？这是受到了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一册的影响。《史稿》只写了一段文字，指出了这时期民族关系走向融合的趋势，这对我启发很大。同时，我也根据恩格斯提出的论点：在早期的各民族关系中，冲突和战争，就是交往的一种形式，就是各族间产生联系的表现。循着这样的思路，我把重点放在“融合”上面。

在撰写过程中，赵先生指导我读书，除上面提到的《春秋大事表》外，还要读江永的《春秋地理考实》、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等。

回想起来，读本科时，多接触一些基本文献，是非常重要的。我交给赵先生的论文初稿，是用毛笔竖行写在毛边纸上装订成册的“稿本”。赵先生退给我时，也是用毛笔作了批语，而且是“硃批”，就像我读中学时，语文老师用毛笔蘸着红墨水批改作文那样。凡是我提到的有关证据不全面的地方，赵先生都批道：“参阅《左传》某年某事”，指示得很具体。当我读到这些批语时，心情非常激动！今天回忆起来，仍有当年的那种感觉。后来，我听别的老师说，在白寿彝先生主持的总结学生毕业论文撰写情况的会议上，白先生还提到了这篇文章。事后，赵先生建议我把论文抄写一份寄给吕振羽先生或当时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的汪锋同志，以便得到他们的进一步指点，但我没有那样的勇气，也就放下了。“文革”中，我始终保存着这篇论文的初稿，因为它浸透了自己两年的心血，也包含着赵先生的许多教诲，总觉得应当加以珍惜。1972年，我到农村走“五七道路”，白天劳动，晚上在生产大队保管员办公室独自整理这篇论文。当时是在内蒙古工作，对民族关系有些新的理解，更加感到这篇论文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这或许就是对现实的理解更加深了对历史的理解吧。“文革”结束后，1980年我将此文寄给《学习与探索》杂志，于1981年在该刊发表。不久，我回到母校工作。当我将这本杂志送给赵先生时，我说了一句话：“赵先生，这是您18年前指导我写的大学毕业论文！”赵先生翻阅着杂志，连声说：“好！好！”

现在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是：“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联想到这篇论文从撰写到发表，经历了18年，它虽不是一篇“大作”，却也是自己读大学本科的一个“足迹”，时间的流逝并没有使这“足迹”模糊，反而显得更加清晰了。每念及此，总是会想到赵先生的指导、“硃批”和后来的建议。尤其重要的是，当我回眸自己的学术、人生之路时，有以下三点是我感到十分庆幸的：一是大学毕业论文写的是民族关系，二是我工作了13个年头的内蒙古是民族地区，三是白寿彝先生在理论上、学术上都十分重视民族关系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与现实。因为有了这几个因素的影响，使我对民族关系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和现实也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这一认识对自己的思想和学术都是很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过程”是重要的，“结果”也是很重要的。